

从《四库全书》编修看乾隆帝的治国理念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and the Qianlong Emperor's Philosophy of Governance

程广媛

Cheng Guangyuan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6 Vol.17

故宫学刊

二〇一六年 总第十七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从《四库全书》编修看乾隆帝的治国理念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and the Qianlong Emperor's Philosophy of Governance

程广媛

Cheng Guangyuan

内容提要：

《四库全书》是清朝乾隆年间纂修的一部大型丛书，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在长达十余年的纂修过程中，乾隆帝秉持着精益求精的修书态度，从典籍的取舍到文字的誊录校核，进行着全程的监督与控制。在《四库全书总目》的字里行间，以及乾隆帝有关修书的诸多谕旨中，都能折射出其对儒家政治学说的尊崇及其治国理政的基本思想。

关键词：

清代 乾隆帝 《四库全书》 誊录校核 治国理念

ABSTRACT: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is an enormous collection of books compiled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in the Qing dynasty. It can be considered as a grand synthe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During the process of its compilation which lasted more than a decade, the Qianlong emperor personally micromanaged every stage from selection of classics to the transcription and proofreading of the text. The text in the *Annotated Catalogue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and the court edicts issued by the emperor related to its compilation both reflect his veneration of Confucian political teachings as well as his fundamental theor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KEYWORDS:

Qing dynasty, Qianlong Emperor, transcription and proofreading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philosophy of Governance

一 《四库全书》之编修与完竣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1773年3月13日),乾隆帝在谕旨中首次提到:“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¹这是“四库全书”之名在清宫档案中首次出现,标志着长达十余年的《四库全书》编修工程的正式启动。诚然,似此卷帙浩繁的一部丛书,其发轫绝非一朝一夕,故而学界对《四库全书》的始修时间各执一词,莫衷一是²。作为该文化工程最高领导者的乾隆帝,曾在其《题文津阁》³诗中明言:

儒臣继晷以焚膏,十载功成亶厥劳^{注一}。装限六年刚及半^{注二},书罗四库度之高。

今冬明夏居诸速^{注三},菲史枕经情性陶。举事晚年竟全藏^{注四},天庥锡庆幸深叨。

注一:自癸巳春开馆辑《四库全书》,至辛丑第一部告成,贮文溯阁;壬寅第二部书成,贮盛京之文溯阁;癸卯第三部书成,贮御园之文源阁;其第四部书,弄此文津者,现在陆续按日进呈,计岁内亦可全完。

注二:全书第一部告成时,馆臣奏,限六年可全完。兹壬寅至甲辰,才及三年耳。

注三:以今冬装潢全完,于明夏临山庄之前,可毕度书架。

注四:癸巳年始命辑《四库全书》,兹事体大物博,彼时举行尚略嫌迟,故甲午联句有“逢会略嫌迟岁月,就将惟冀愿观成”之句。今甲辰甫逾十年,指期告藏,实深庆幸也。

此诗作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而癸巳年正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由诗文及自注中“自癸巳春开馆辑《四库全书》”、“癸巳年始命辑《四库全书》”、“十载功成”及“甫逾十年”等句可知,乾隆帝认为乾隆三十八年为《四库全书》的始修时间。

此后,各项工作渐次展开,首要工作便是机构和人员的设置。

“四库全书处”是《四库全书》编修伊始所设置的正式机构。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1773年4月14日),乾隆帝降旨:“此次考列二等之陆蓉等十四名内,有愿在四库全书处效力者,准其在誊录上行走。”⁴这是“四库全书处”作为机构名称的首次出现。此后,随着编修工作的进一步展开,逐渐出现“四库(全书)馆”的说法。对此,张升先生研究指出:“四库全书处是官方正式机构用名,而四库馆是对其的泛称或俗称。后来,四库馆的说法更多地(正式或非正式)被用来称呼办理《四库全书》机构。因为,四库全书处一般是单指设在翰林院的办理四库全书处,而四库馆则既包括翰林院四库馆(办理处),还包括武英殿四库馆(其中以缮书处为最重要)。”⁵通行的机构“四库馆”,又分为翰林院四库馆和武英殿四库馆两大系统。翰林院四库馆,即

1 《大学士刘统勋等奏议定校核〈永乐大典〉条例并请拨房添员等事折》,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张书才主编,吕坚编辑:《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58~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2 各方意见,参见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第一章“四库馆开、闭馆时间”中的相关内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3 《题文津阁》,《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集》(第八册)御制诗五集卷九第十九,第35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4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壬子条,《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二九,中华书局,2008年。

5 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第43、63页。

办理四库全书处，负责纂办《四库全书》，以纂修官为代表，下设总办处、提调处、校办处（又分校办《永乐大典》辑佚书处、校办各省遗书处和校办内府发出书处）、总目处和收掌处等。武英殿四库馆，主要是指缮写四库全书处，负责缮写、分校、刊印、装潢《四库全书》，以分校官为代表，下设缮书处（又分提调处、复校处、分校处、黄签考证处、督催处和收掌处）、武英殿收掌处、武英殿监造处、聚珍处（馆）、校刊翰林处、荟要处等。

早在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启动《四库全书》编修工程之前，已有校核《永乐大典》工作之先声。以军机大臣刘统勋、刘纶、于敏中和福隆安四人为总裁官，后又续增王际华和裘曰修二人为总裁官。迨至《四库全书》工程启动，即以此六人为四库全书处总裁官。正如乾隆帝圣谕所言，“现在办理四库全书，卷册浩繁，必须多派大臣，董司其事”，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十一日（1773年5月2日）降旨：“刘统勋、刘纶、于敏中、福隆安、王际华、裘曰修，俱著为正总裁。英廉、庆桂外，并添派张若淮、曹秀先、李友棠为副总裁。”¹ 在进一步追认正总裁名义的基础上，添派五名副总裁，组成十一人的领导机构。在此后的十余年里，出任总裁官的有正总裁十六人，副总裁十四人²。

在“总揽馆事”的正、副总裁之下，清廷设置了堪称完备的工作团队：

总裁之下，有总阅官，总理阅定各书之事。有总纂官，总理编书之事。有总校官，总理校订之事。有总目协勘官，管理协定全书总目之事。有翰林院提调官、武英殿提调官，管理提取两处藏书之事。

总纂官之下，有纂修官，分任编书之事。纂修官，又分为四种：一、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官；二、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三、黄签考证纂修官；四、天文算学纂修官。

总校官之下，有分校官，分任校订之事。分校官，除篆隶分校官、绘图分校官外，多由纂修官兼任。

缮书处，专掌钞书之事。有总校官，总理校对脱误之事，有分校官，分任校对之事。

督催官，专掌督促编书钞书之事。

翰林院收掌、武英殿收掌、缮书处收掌，分任三处书籍出入之事。

监造官，专任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之事³。

可以说，即使以现代图书编纂工程的人事组织结构来衡量，《四库全书》编修团队的组织分工都是极具科学性和严谨性的。正是在这样的团队合作中，《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才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且越到后期进度越快。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六日（1782年1月19日），第一部《四库全书》告竣，藏之于大内的文渊阁。乾隆

1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三〇，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庚午条。

2 他们分别是：正总裁——皇六子永瑢、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理、刘统勋、刘纶、舒赫德、阿桂、于敏中、英廉、程景伊、嵇璜、福隆安、和珅、蔡新、裘曰修、王际华；副总裁——梁国治、曹秀先、张若淮、刘墉、王杰、彭元瑞、钱汝诚、李友棠、金简、董诰、曹文垣、沈初、庆桂、钟音。《四库全书总目》卷首，有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馆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第一部《四库全书》告竣期间在馆任事诸臣的衔名，但其副总裁一栏仅有十人，独缺张若淮、李友棠、庆桂、钟音四人。前三人已如前述，钟音亦于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778年6月20日）被任命为副总裁。（《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〇五七，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乙酉条。）

3 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第9～1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四十七年(1782),第二部告竣,藏之于盛京(即沈阳)故宫的文溯阁。乾隆四十八年(1783),第三部告竣,藏之于北京西北郊御园——圆明园的文源阁。乾隆四十九年(1784),第四部告竣,藏之于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九日(1782年8月17日),即第一部《四库全书》弃置大内文溯阁之际,乾隆帝再颁圣谕:“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之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著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分,安置各该处。”¹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十七日(1787年6月2日),续办的南三阁《四库全书》同时告竣。据黄爱平先生统计:“以全书册数计,每分约为36,000册,七分合计252,000余册;以全书页数计,文津阁《四库全书》2,291,100页,七分合计16,030,000余页。”²

除洋洋大观的七部《四库全书》外,乾隆帝“以兹事艰巨,不易观成,特命馆臣先行纂辑荟要二分:一贮(大内)御花园之摘藻堂,一贮长春园之味腴书屋。每分收书473种,11251册,二分合计共22502册”³。

二 《四库全书》之誊校与赏罚

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它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总计10254种,172860卷,基本囊括清代乾隆朝以前中国古代的主要典籍⁴。其规模谓之空前,其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亦令古今中外难以望其项背。即以馆臣数量而论,据张升先生考证,前后在馆的四库馆臣共有476人⁵,远远超过《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中列名的360人。而此一数据尚未包括为数甚夥的誊录人员和校对人员等。在长达十四年甚至更久的编修过程中,怎样驾驭巨工,以求保质保量地推进修书工程,成为萦绕乾隆帝心头的难题。

鉴于入选《四库全书》的书籍底本来源不一、制式不齐,且相当一部分书籍尚属借阅性质,故对入选的书籍,全部采用抄本形式。这便涉及到修书过程中两大步骤——誊录和校订。

由于《四库全书》卷帙浩瀚,字数繁多,誊录人员纵以数百计⁶,亦是时间紧、任务重,繁难之至。有鉴于此,总裁官们打破前此各馆誊录工作“不核计字数”的惯例,设置“稽核字数考勤簿”,明确规定:“每人每日写一千字,每年扣去三十日为赴公所领书交书之暇,计每人每年可写三十三万字”⁷、“五年共限写一百八十万字”⁸(按:誊录人员,每五年一考成)。甚至对某些专业性书籍,亦能做到视具体情况而变通处理:“篆字以一作十,隶字

1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一六〇,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九日条。

2 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第15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3 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自序”,第1页,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7年影印本,上海书店,1992年。

4 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附录一·《四库全书》续修与影印简述”,第411页。

5 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附录一·四库馆馆臣表”,第354~389页。

6 四库全书馆额设誊录是六百人,其中包括缮写《四库全书荟要》的二百人。根据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吏部尚书刘墉奏折统计,前后参与内廷四阁《四库全书》及两部《四库全书荟要》缮写工作的誊录共计二千八百四十一人。

7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十一日办理四库全书处奏折,王重民编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国立北平图书馆排印本,1934年。

8 《多罗质郡王永琿等奏戈源请膳录计字议叙应毋庸议折》,乾隆四十年四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张书才主编,吕坚编辑:《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376~380页。

以一作五，绘图一页作字一千，疏者自两三页至八九页折作一页，密者一页申作两三页至十页不等。”¹自上而下对修书进度的过分强调，甚至以字数之多寡定考成之高低，必然导致誊录过程中讹误的大量存在。有误差形近之字，有挖补未填，有涂抹未补，有重写或漏写。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就某种程度而言，校订工作成为《四库全书》编修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和最后防线。《四库全书》质量之高低，能否反映清代学者大规模整理古代典籍的成绩，端视校订之优劣。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十三日（1773年11月26日），乾隆帝在翻阅《四库全书荟要》进呈本时，“信手翻阅，即有错字二处”，由此推断“其书写舛误者谅复不少”，要求总裁大臣“妥立章程，俾各尽心校录无讹之处”²。

五天后，多罗质郡王永琿等便议覆《功过处分条例》³三条：

一、“严核功过，以示劝惩”。按照制度的设计，需要经过“誊录——分校官——复校官——总裁官——皇帝”层层校核的流程。对于原本有讹误者，无论誊录、分校官和复校官，哪一级能改正原本讹误，便“每一处记功一次”。若原本无讹误，而誊录误写为错者，“每错一处记过一次”。若是分校官和复校官未能改正错处，亦“每一处记过一次”。待到最后一个环节，即进呈皇帝后，“经皇上指出错误，即将复校、分校、誊录人员加倍记过，并将臣等总裁交部察议”。

二、“添设功过簿，以专责成”。其具体做法是“将复校、分校、誊录人员，各设功过簿二本。每交书一次，臣等查核填注，一贴武英殿备查，一交本员收执”，“至五年期满后，将功过簿详加核对”。对于誊录人员，则择其功多过少者、功过相抵者和过多功少者，列为三等，“移咨吏部，分别班次铨用”。而对于有过无功者，凡是“字画潦草之员”，即“随时甄别淘汰”；若是“字画尚属端楷，惟错字不能尽免者”，则“留供抄录”；“其错字多者，再留誊写二年”；“错字较少者，再留一年”，然后“咨部议叙”。对于复校、分校人员，则择其功多过少者和功过相抵者，“分别班次，带领引见”。其过多功少者，“止须交部，分别加级记录”。而对于有过无功者，五次以上，“即行汰回本衙门，另行拣员补换”。

三、“校出原本错讹更正之处，应附载卷末”。针对旧有刊本与进呈抄本中多有错讹的情况，馆臣借鉴“钦定经史刊本，卷后俱有考证”的成例，要求分校、复校各员将更正之处“附载卷末”。其具体做法是：“如仅系笔画之讹，仅载某字讹，某今校改。如有关文义考订者，并略附按语于下。”由此观之，《四库全书》的校对工作，不仅校今人之谬误，而且纠古人之错讹。其范围早已超越自我检视的基础层面，而带有校订古书的考据内容。

从《功过处分条例》的前两条来看，对誊录和校订工作完成情况的考核，已经通过量化指标达致非常细密的程度。然而，《四库全书》进呈本仍是屡有错误，使乾隆帝忧心“其未经阅及者，讹误尚不知凡几”，遂再降严旨：“自今年（即乾隆四十二年）正月起，所有进过书籍讹错之处，交军机大臣通行查核。经朕看出

1 《吏部尚书刘墉等奏遵旨清查四库全书字数书籍完竣缘由折》，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张书才主编，吕坚编辑：《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926～1931页。

2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四四，乾隆三十八年十月戊戌条。

3 《多罗质郡王永琿等奏议添派复校官及功过处分条例折》，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张书才主编，吕坚编辑：《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67～171页。

错讹者，其分校、复校名下错至两次，总裁名下所校错至三次者，均著查明，奏请交部议处。”¹对于交部议处各员，其总裁应议者“罚俸半年”，复校、分校应议者“罚俸三月”²。此一规定，每三月举行一次，直至内廷四阁《四库全书》办理完竣乃止。

虽有以功过簿为核心的制度性建设的层层加码，但校勘之实效却不尽如人意。乾隆三十九年（1774）二月间，乾隆帝发现《四库全书》进呈本中“圣祖仁皇帝御制诗集内‘桃花’的‘桃’字，误写‘梅’字”，且“未经校出”，进而推断“其他舛误处，谅更不少”，乃大发雷霆，遂降旨：“王际华、蔡新、张若淮、曹秀先、李友棠，俱著交部察议。其复校、分校等员，并著一并交部议处。”³

若言此为冰山一角，并不为过。仅从现存的四库全书馆记过清单和记过档案来看，分校官、复校官（以及随后改设的总校官），甚至总阅官、总裁官未能及时校出的讹误，真可谓俯拾皆是。“办理各员被记过次数几乎数不胜数，少则数十次、数百次，多则上千次，最高的纪录竟然达到三千七百二十八次。而这些还都是经过层层磨勘，最终得以改正的讹误及过失。”⁴至于那些未经发觉的讹误，仍是比比皆是，这也是随后重校工作出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⁵。

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间，在翻阅南三阁《四库全书》进呈本时，乾隆帝发现竟有李清所撰《诸史同异录》这种充斥违碍言论（如将清顺治帝与明崇祯帝相比）的书籍忝列其中。盛怒之余，将办理四库全书事务的诸位皇子并总裁官等“交部严加议处”⁶。待到五月十九日（7月3日），以秋猕木兰驻蹕避暑山庄的乾隆帝，检阅文津阁所贮《四库全书》，发现其中同样讹谬甚多。有鉴于此，乾隆帝决计重行校勘《四库全书》：派随扈热河的皇子校阅文津阁所贮《四库全书》，派在京之皇六子永瑤校阅宫中文渊阁所贮《四库全书》，在京之皇八子永璇校阅圆明园内文源阁所贮《四库全书》。此番重校，可谓兴师动众，以每人每天二匣书的工作量，前后两月，共动用二百五十余人⁷。

三 学术与政治：《四库全书》编修面面观

乾隆帝在誊校工作中精益求精的态度，足见其对《四库全书》纂修工程的高度重视，其深层次动机随着修书工程的推进而呼之欲出。赅而言之，乾隆帝对《四库全书》纂修工程的重视，有着两方面的考量，一曰学术，一曰政治。

从学术角度考量，须关注清初康乾之际的学术转型：一是汉宋之争中，宋学之式微与汉学之勃兴。从康熙到乾嘉，呈现出宋衰汉盛的主流趋势，至考据学之勃兴而达致巅峰。究其缘由，“宋学家，空言义理，至

1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〇二九，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庚寅条。

2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〇三七，乾隆四十二年七月戊子条。

3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五三，乾隆三十九年二月甲辰条。

4 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第150页。

5 “《四库》又经历过两次大的重校（内廷四阁《四库》初次重校完是在乾隆五十五年，再次重校完是在乾隆五十七年。南三阁《四库》自乾隆五十二年起也经历过两次复校）……一直到嘉庆十一年才最后结束。”见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第35页。

6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二七七，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丁亥条。

7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二八一，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乙酉条。

明末而厌之者已多。清初标榜宋学者，又多屈事北庭，愈失社会上之信仰。康熙两朝，虽极力奖励，而终不能得多士之心”¹。学人遂群起而弃宋学之径，驱汉学之门。此间，清廷统治者的因势利导，亦功不可没。二是类书时代之终结与回溯原典之新潮（任松如和郭伯恭二位先生，称之为“求读原书之新时代”²）。“类书，专供词章家之采摭，不独汉学家恶其芜杂，即宋学家亦鄙其浮华。”³而作为类书之代表的康熙朝所编《古今图书集成》，亦被郭伯恭先生认为：“虽可谓伴于清初之文化，然却不足以施之于乾隆时代之学风。”⁴综合前两点来看，整个学术圈都对“辑佚书”的大规模古籍整理活动充满期待。三是“儒藏说”的兴盛。“儒藏说”，源于明人曹学佺，后经丘琼山、陆世仪等人之阐释，至乾隆年间的周永年处终得实践。周永年以“儒藏与释藏、道藏鼎足而三”为职志，自筑“贷书园”，聚书其中，以招致来学。乾隆帝有感于此，乃有《四库全书》（尤其是供江南士人使用的南三阁《四库全书》）之问世。

从政治角度考量，前此学者皆有较多论述。郭伯恭先生认为：“高宗诏访遗书，编纂四库，其政治作用，一言以蔽之，即寓禁于征也。”至于禁书之故，郭氏则从“消灭清初史事之记载”和“遏止汉人之反清观念”两个角度予以剖析⁵。而任松如先生更是洋洋洒洒地从十个方面阐释乾隆帝修书的十三种“私意”⁶。自《四库全书》纂修工程启动以来，各方学人对此一文化工程即多有贬斥，而其出发点更多地是从乾隆帝修书的方式来考量：一是伴随着征书活动的禁毁劣行，二是抄书过程中的主观去取。一言以蔽之，就是质疑其通过删改不利于大清的文献记载，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清帝销毁了多少部禁书呢？据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载，河南、浙江两省应毁书目共二千六百余种。据陈乃乾《禁书总录》载，江西、湖北、广东三省合计全毁及抽毁共二千九百二十九种⁷。以上五省的毁书总量即已超过《四库全书》全部，毁书之量远逾辑书之数，如果再加上全国其他省份的毁书之量，那么《四库全书》的纂修过程同时即伴随着空前规模的禁毁典籍之举，也是中国专制时代一场非常罕见的文化浩劫，已是不争的事实。

对乾隆帝纂修《四库全书》的政治目的，以往学者多从禁书的数量和内容等方面，来衡量清廷统治者维系其专制统治而肆意禁绝、毁灭古籍的历史罪行。有鉴于此，笔者拟从《四库全书总目》的文本内容以及乾隆帝有关《四库全书》纂修的圣谕内容中，剖析其对儒学典籍中政治理念的看法。

《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自始至终都是在乾隆帝的直接控制之下进行的，所谓“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禀天裁”⁸。换言之，可以从《四库全书总目》中古代典籍的取舍，以及书目提要、分类排列甚至议论评介中，参悟乾隆帝的政治思想倾向。《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之“凡例”直言不讳：“今所采录，惟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何谓离经叛道？即儒家经典之外的各家学说，佛、道二教等均在贬斥之列。在此，笔者拟以东汉王充的《论衡》和明末李贽的《藏书》为例

1 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第8页。

2 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第8页。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第2页。

3 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第8页。

4 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第2页。

5 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第3～5页。

6 详见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中“第六问：乾隆帝之私意何若？”第6～9页。

7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二册），第4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8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之“凡例”。

做一剖析。

东汉王充的《论衡》，有着“疾虚妄古之实论，讥世俗汉之异书”的美誉，反映着中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是一部宣扬无神论的哲学类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却集中火力指责：“《刺孟》、《问孔》两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悖矣。”¹遂将其贬入“杂家”一类。明末李贽的《藏书》，其“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的观点，成为明清之际攻击儒家学说专制教条的急先锋，亦遭致《四库全书总目》的深恶痛绝：其“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故“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牘”，因而仅“存其目，以深暴其罪”²。至于其他那些攻击儒家学说或是夹杂非儒学思想的著作，亦多遭致《四库全书总目》的口诛笔伐。

与捍卫儒家学说正统地位的言行互为表里，《四库全书总目》对儒家封建道德观念中“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等政治理念更是大力地尊崇与宣扬。尤其是其中的“君臣大义”，更是乾隆帝强调的重中之重。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廷独出心裁地在全国范围内对前明“死不忘君，无惭臣节”的忠义之臣展开普查和赐谥活动，并将所有赐谥人名汇编成卷册，题曰《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辑入《四库全书》。回顾明清之际史事，所谓“胜朝殉节诸臣”，皆是身系明臣、与清为敌者。此番赐谥的哀荣，有着更深层次的动机：宣扬君臣大义是大清王朝同样重视的为臣之道，更是宣扬乾隆帝跨越满汉、敌我之狭隘界限，为天下共主的至尊地位。在这种动机的指导下，对于那些降清的明臣如洪承畴等人，则立《贰臣传》以书之，同样是宣扬君臣大义。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馆臣更是赤裸裸地说道：“自书契以来，未有天地为心、浑融彼我、阐明风教、培植彝伦、不以异代而歧视，如我皇上者。”³由此可见，《四库全书》(包括《四库全书总目》等)的编纂，尤其是其对古代典籍的取舍和褒贬臧否，凸显着清廷最高统治者对儒家学说及其基本政治理念的尊崇。

《四库全书》纂修之不易，从乾隆帝的圣谕中略见一斑。以《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为例，语涉“四库全书”的谕旨，即有122篇、205处，其中不难看出乾隆帝在修书过程中一己之思考，尤其是其对历朝历代政治得失的归纳与总结，某些部分堪称佳论。

乾隆四十九年(1784)七月间，乾隆帝阅及《四库全书》中《大清通礼》一书，认为“所列庙祀历代帝王位号，乃依旧会典所定，有所弗愜于心”，遂命廷臣更议历代帝王庙祀典。究竟是哪些内容让乾隆帝“弗愜于心”呢？其实，早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廷臣即奉旨重议历代帝王庙祀典。依康熙帝之意，“凡帝王曾在位者，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此外尽应入庙。即一二年者，亦应崇祀”。但在选取群臣的过程中，却出现这样的状况：“入辽、金二朝，不入东西晋、元魏、前后五代。”对此，乾隆帝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虽祖宗得国不正，而子孙能继绪承休，即为守文中主，亦不可概从缺略”。对这种一登一黜之间意有偏向的做法，给予纠正。另一方面，康熙帝在增减明朝诸帝祀典的时候，以明之亡实由于神、熹二宗(即万历帝和天启帝)而不由于愍帝(即崇祯帝)，遂夺前者而予后者。但此番群臣讨论汉朝诸帝祀典的时候，却增入桓、灵二帝，这与乾隆帝“炎汉之亡，

1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〇，《论衡》提要。

2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〇，《藏书》提要。

3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八，《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提要。

亡于桓灵，而不亡于献帝”的想法南辕北辙，亦得到乾隆帝的指摘和纠正¹。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间，在责令四库馆臣纂辑《历代职官表》一书以入《四库全书》之时，乾隆帝就“丞相”一职以及“君权”与“相权”这一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重要命题予以阐释。尤其是对明朝废丞相之举，乾隆帝认为徒有其表：“明洪武因胡惟庸之故，改丞相为大学士。其实官名虽异，职守无殊。”在乾隆帝看来，设官分职应循名责实，而其关键“惟在人主太阿不移，简用得人”。对于古人重视相权的论调，乾隆帝嗤之以鼻：“盖有是君，方有是臣。惟兵克艰厥后，庶臣克艰厥臣。昔人言：‘天下之安危，系乎宰相。’其言实似是而非也。”可以说，专制主义皇权政治能够在清代发展至巅峰，与康熙乾隆诸帝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批判性改造有着密切的联系²。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月间，四库馆臣在讨论元末明初人杨维桢所著《正统辨》一文（《杨维桢文集》中未收入此篇，乃载于陶宗仪的《辍耕录》）是否入《四库全书》之时产生疑虑。因杨氏以为，元朝承宋朝之正统，而将辽、金二朝排斥于统绪之外。馆臣“以金为满洲”，意欲形成“宋—辽—金—元”的统绪谱系，故而主张将《正统辨》一文剔出《四库全书》。但乾隆帝对此毫不买账，认为馆臣之言“似是而非”，“杨维桢撰《正统辨》，凡二千六百余言，义本春秋，法宗纲目”，“其论颇正，不得谓之纰缪”。在乾隆帝眼中，正统的承继自有其春秋大一统之义的限定，并不以其国之大小强弱判定。即如前后五代时期，正统亦分别在宋齐梁陈和梁唐晋汉周一脉，而不在其他。因此，乾隆帝乾纲独断，坚持“不但《辍耕录》中所载杨维桢之《正统辨》不必删除，即《杨维桢文集》中亦当补录是篇”³。

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间，乾隆帝在翻阅养心殿藏书时，意外地检出《明朝宫史》一册，“其文义粗鄙，本无足观。盖明季寺人所为，原不堪采登册府”。但乾隆帝竟做出惊人之举：“著将此书交总裁等，照依原本，钞入《四库全书》。”一本描述宫闱琐屑之事的小书，怎会有此殊遇？乾隆帝自问自答道：“以见前明之败亡，实由于宫监之肆横。”古来阉祸，未有如汉、唐、明三朝之烈者。乾隆帝此举，是以这本《明朝宫史》为标靶，为子孙万世考镜得失之鉴戒⁴。

明清鼎革之际，明朝宗室福王朱由崧、唐王朱聿键和桂王朱由榔，先后在长江以南地区建立起弘光、隆武和永历三个南明小朝廷，后一一为清军铁骑所颠覆。清朝初年，为表“得国之正”，清廷统治者将其一概视为伪朝，其史迹例从删削。时至乾隆年间，国家承平百年，对诸多历史遗留问题有了纵深思考的空间。乾隆四十年（1775）闰十月间，在敕命编纂《通鉴辑览》一书时，乾隆帝即生发出新的思考。在他看来，福王朱由崧的弘光小朝廷，似乎有着南宋高宗赵构“建炎南渡”的偏安之机，只是其“自贻颠覆”；而唐王朱聿键和桂王朱由榔的隆武、永历小朝廷，实与“宋末昺昞二王之流离海岛者”相类，更不足载诸史册。但为使“读者咸知朕大中至正，未尝有一毫私意偏倚其间”，遂命四库全书馆总裁等，继福王朱由崧之后，将唐、桂二王的史迹本末别为附录卷尾，载入其中⁵。

1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二一〇，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条。

2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一一五，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壬辰条。

3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一四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条。

4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一五五，乾隆四十七年四月癸未条。

5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九五，乾隆四十年闰十月己巳条。

前述皆为乾隆帝在监修《四库全书》过程中，对清以前历朝历代政治得失的归纳总结。对入清以来一百余年间本朝政治与史迹，乾隆帝并未留待后人评说，而是将纂修国史视为“彰善瘅恶，信今传后”的重要手段。在乾隆帝看来，“前代诸史，皆由后世史官编纂胜朝事迹，历年久远”，以致闻见多有失真。他则秉持当代人修当代史的精神，命四库馆臣将“所有现办满汉臣工表传，及宗室王公表传、蒙古王公事迹，其在乾隆四十年以前者，速为纂办。勒限五年，陆续进呈，候朕钦定成书颁行，并写入《四库全书》，垂为信史”。至于这些史记，是失真抑或信史，端视乾隆帝之钦定。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的最大丛书，不仅因其中华传统文化宝库的文化价值而闻名海内外，更因其作为传统社会中难得一见的大型文化工程的历史价值，而备受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和青睐。在前后十余载的寒来暑往中，作为最高纂修官的乾隆帝，从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到觅书、选书、誊录、校核和刊行的每一道程序，都以精益求精的态度、事必躬亲的姿态去执行和监督，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一己之意志。正由于此，细细品绎《四库全书》的校勘过程，对乾隆帝之于儒家政治学说的尊崇及其治国理政的基本思想有一个较之以往更为透彻的认识。除此之外，对《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人事安排及制度设计方面的研习，对当前的大型修书文化工程的有效运行，同样具有极高的历史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学术著作分社]